

实现社会发展战略的转换

——“社会发展研讨会”第一次会议纪要

“社会发展研讨会”第一次会议于1986年2月21日在北京举行。“研讨会”，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与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联合主办的。以后准备连续开下去。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来自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实际工作部门的专家学者共三十多人。

“社会发展研讨会”准备就我国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进行探讨。第一次会议的中心议题为“从传统的‘增长第一’战略向社会发展战略的转变”。与会者从战略转变的国际国内背景、两种战略的特点及其区别、战略转变的理论依据、研究社会发展的方法论问题等四个方面进行了热烈讨论。现将会议中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何建章**同志参加了会议讨论并首先发言。他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但是，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需要社会科学工作者认真研究的。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不仅仅是经济的，而是综合性的，是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希望把社会发展研讨会认真办好。他认为，中国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也同样面临着一个发展战略的转换问题。建国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实行的实际也是“增长第一”的战略，片面追求高速度、高指标、高积累，而不注意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情况有所好转。第六个五年计划改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就是一个战略性的转折。但是如何实现社会的协调发展，还并不明确，特别是在实际工作中往往走样，这就造成社会发展的失调。近几年来，经济确实增长了，人民的收入 and 实际生活水平也在提高，但不满情绪也增加了。这里除了模式转换配套不够的原因外，说明我们的发展战略本身还有问题。

孙立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1985年是中国改革进程中具有关键意义的一年。在这一年中，以结构简单的农村改革为中心转变到结构复杂的城市改革全面铺开；从原来的经济领域的改革，扩展到科学、教育、文化领域。从目前进展来看，改革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和突破。一些旧的结构和局面在打破，同时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摸到了一些敏感部位。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目前在群众情绪上已有所反映。

在这些问题中首先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有两点：

第一，对改革和整个社会发展的理论准备不够。从实际情况看，由于理论准备不足，改革及整个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和模式并不明确，这样，具体的措施也就难以配套。

第二，目前出现的问题，并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有的表面上看来是经济问题，但背后却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这里涉及到政治体制、文化传统、利益结构等一系列问题。

这就要求我们，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对中国几年来的改革和社会发展进行一些理论上的

反思。对未来发展的目标、战略、模式进行探讨。

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报告中曾有一段关于我国社会发展目标的系统论述，可以概括为三句话，一句是“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一句是“工农业生产总值翻两番”，一句是“小康水平”。在其他一些场合，党中央还强调“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前些年还曾开展过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大讨论。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就成了一句话：翻两番。于是出现了一个不顾一切的翻番竞赛，结果是不仅造成经济结构的失调，也造成整个社会发展的失调。

关于“增长第一”战略的弊病，大家已经讲了很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不能继续实行这种战略，有两个重要的制约条件。一个可以叫做“资源制约”。美国是以占世界6%人口，使用世界40%的能源才达到这样高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有人计算，如果发展中国家都达到这个标准，资源耗费将是现在的六倍。当前不能否认资源潜力的存在，但潜力的发掘，恐怕不会首先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另一个可以叫做“效果制约”。发展中国家实行“增长第一”战略的结果已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和政治不稳定。这种结果本身已使他们很难继续实行“增长第一”的战略。而这两个“制约”目前在中国都是存在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走到另一个极端。从国外来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可能即将进入第五个发展长波，苏东在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亚太地区正在崛起。从国内看，近几年我国经济确实发展很快，但还有六、七千万人的温饱问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在这两个方面，我们都承受着发展经济的巨大压力。因此，我们既不能片面强调“增长”而忽视“发展”，也不能离开“增长”谈“发展”，关键是找到这两者的接合点。

陈一筠（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发展战略的转换，是现今各个国家面临的一个普遍性的问题，特别在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当这些国家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开始独立发展时，大多数采取的都是所谓传统发展战略，即“增长第一”战略。这种战略把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做为追求的目标，以为经济增长了，其他目标就可以自动实现。但从实际结果来看，在实行联合国第一个发展十年（从1960—1970年）期间，发展中国家国内的贫富差别进一步拉大了。在国际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进一步拉大了。这说明，靠“增长第一”战略并不能解决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一系列迫切问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新的发展战略。这些新的战略尽管名称和内容各不相同，但共同的主张都包括：一是解决贫困，二是人人康乐，即每个人都有基本的生活条件，有受教育和参与决策的机会。

高钰（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是战后国际关系和学术界中引人注目的一个问题。但近些年来，关于发展的理论正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发展模式的变化。在五、六十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主要是受西方经济学传统学派的主宰，把国民生产总值做为衡量发展的标准。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障碍就是缺乏资金。因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一种贫困的恶性循环，即“低水平均衡陷阱”：人均收入少—→储蓄少—→投资少—→劳动生产率低—→人均收入少……。而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就必须来个“大推动”。“大推动”所需的资金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

国内的储蓄,主要通过征税、提高利润和通货膨胀等手段;二是外部资金,主要通过政府赠款、贷款以及私人直接投资等手段。这种模式一开始就受到批评。于是“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1970—1980)提出了一些新的目标,但也主要是侧重于国内,没有涉及到国际秩序。近年来,许多人指出,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主要不在内部,而是在与发达国家的 关系方面。七十年代出现的“依附理论”就是一种有代表性的理论。他们认为,正是国际间富国与贫国的关系产生并维持了穷国的不发达状态。在这种理论中,有人主张富国应通过外援交纳“国际所得税”,更为激烈的观点则主张发展中国家应与国际体系“脱钩”,阻止外贸、技术、跨国公司、教育与思想影响的侵入。但也有人认为,目前的国际秩序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双重意义:它既可以加速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是不发达的根源;它一方面可以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的机会,也可以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造成障碍。因此,应当采取有选择的政策,使之从积极因素中得益而免从消极因素中受害。

二是“发展”涵义和衡量尺度的变化。早期的发展思想把“经济增长”做为衡量发展的主要标准。其理由是:1.增长的果实将会间接但迅速地流注到穷人中去,即“涓流效应”。2.政府的调节将会重新分配增长果实。3.不平等和贫困是增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因为只有通过富有阶层的积累,才能具备向贫困开战的基础。但实践证明这三种设想都不可行。于是有人提出“边增长边分配”战略。但问题是,不平等的减少并不能消灭贫困。这样,“满足基本需求”的战略应运而生。所谓基本需求,不仅应包括能够购买生活必需品,还包括足够的营养、安全用水、持续就业、子女教育条件的提高和改善、更好的预防性医疗服务、适当的居住条件、便利的交通工具等。更进一步说,还包括有关的社会、文化、政治条件,如自决权、自力更生、政治自由和安全、参与影响公民生活的决策、保存民族与文化特性、工作与生活的目的性、人的才能的充分发挥等。

三是发展问题范围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从重视一国发展研究到日益重视国际性的共同问题。如资源问题、生态环境、海洋与海床、世界人口等。对此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强调加强全球合作,重视互相依存。如“地球号宇宙飞船”的观点就是一例,他们认为,整个人类都是“地球号宇宙飞船”的乘客,生死与共。因此要从全球角度来考虑资源、环境、人口等问题。另一种则是伴随富国孤立主义而出现的主张。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生物学家哈定提出的“救生艇哲学”,认为在全球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只能有一部分人登上“救生艇”,如所有的人都上来,就只能同归于尽。“分类优先治疗”的观点亦属此类主张。

1975年,哈马舍尔德基金会提出一份文件,题为《现在怎么办:另一种发展》。这份文件认为,世界资源是足够满足基本需求的,问题在于更加公平地分配资源。“另一种发展”的主要内容是:1.发展的目的旨在满足人们的需要,首先是消灭贫困。2.发展靠自身力量和自力更生。3.发展要和环境相协调。

李 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发展中国家实行“增长第一”战略的结果不同程度地导致或加剧了政治动乱。从发展中国家近些年的情况看,群众不满情绪的发生往往不是在经济增长以前,而是在经济增长以后。这是由于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两极分化加剧了。

为了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需要进行社会指标研究。社会发展是综合性的,牵涉到多种要素,每一要素又有多方面的特性。因此,人们在制定社会发展战略时,就不能只涉及某几个方面的指标,而必须提出综合性的指标。前些年西方社会学界就提出了“社会指标体系”

问题，并在六、七十年代形成了一个“社会指标运动”。所谓“社会指标体系”，就是“社会综合性指标体系”，它的一个特点就是由过去的突出经济指标，转变为突出社会多方面综合指标。以美国为例，在1903—1948年间，经济指标占60%，非经济指标占38%，而在1954—1964年间，经济指标只占47%，非经济指标占52%。在我国，社会指标的研究还是一个弱项。我们只有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指标体系，才能把全面社会发展的思想具体化。

张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两种发展战略的分歧，实际上提出了历史原则和伦理原则的关系问题。公平与增长的矛盾，现在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更重要的是要有勇气正视历史，正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黑格尔的思想富于一种伟大的历史感，敢于承认恶在历史上的作用。就我们国家来说，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好，还是都富裕不起来好。做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发展，当然要注意到弱者，但又不能围绕弱者。也就是要尊重规律，同时兼顾伦理原则。这里要有辩证法，不能搞形而上学。比如环境指标，在我国目前生产发展水平下，环境指标只能是较低的。如按高指标，大部分工厂就要关闭。就是说，要有一个咬牙熬过去的过程。

宋书伟（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社社会学室）：最近我们正在搞北京市发展战略研究，从实践当中我们深深感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我们实现战略转变的理论基础。在马克思那里，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是一个有机整体。当然，当年马克思为了批判历史唯心主义，特别强调了经济的作用，但马克思并没有忽视社会其他方面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决不是什么西方人所讲的“经济决定论”。列宁就很重视上层建筑的作用，提出首先夺取政治权力然后变革生产关系。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的现实意义之一，就是把社会发展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实现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而这就需要改变“小社会”的概念。科技、经济、社会三者的关系是什么？是并列的、交叉的，还是统一的？我认为这三者的关系不能并列，科技、经济都是社会的组成部分。这样讲的社会是一个“大社会”，它既包括社会中的各个组成部分，也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起这样一个“大社会”的概念，社会协调发展才有了基础。

宋毅（北京科学学研究中心）：要实现社会的协调全面发展，需要改变已不科学的思维逻辑。近年来，出现了一批诸如“大科学”、“大经济”、“大社会”的概念。它标志着，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冲破了过去分裂状态，各个学科都想把其他部分囊括进来。这些“大”的概念，从本质上说表明了一种联系。这就必然会改变固有的思维逻辑，改变科学中的概念体系。

许金生（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社社会学室）：从“增长第一”战略转变到社会全面发展的战略，必然涉及到人和社会的关系。在社会发展中，是人围绕社会，还是社会围绕人？我认为应该是后者。社会发展不能离开人的发展。最近进行的一些调查表明，现在人们的积极性比较低，有的是没有积极性，有的有积极性不能发挥出来。因此，人的潜力和创造力的发挥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它不仅仅是发展的手段，也是社会发展的目的之一。

1986年3月

（黎平整理）